

“规范性的语言与形而上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松青

在北欧哲学界,以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哲学系为中心的规范性研究小组是除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规范性研究小组之外欧洲又一重要的“规范性研究中心”,从2013年以来连续举办了几次颇具规模的以“规范性”为主题的学术会议。2016年5月31~32日,乌普萨拉大学哲学系又举办了题为“规范性的语言与形而上学”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四十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涉及规范性研究的一系列最新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汇集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范事实的解释与辩护

规范事实(还有规范属性、规范关系等)是规范性的形而上学论争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在对待规范事实的态度上,可以区分为自然主义和非自然主义两派。非自然主义者大多认为,规范事实是独立自存的,它不同于自然事实,也不能还原为自然事实。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了自然主义者的各种攻击。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莫顿(Justin Morton)试图为非自然主义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他从所谓的“非自然主义的结构”出发,认为非自然主义的结构是由“非自然”、“非完全”和“结构”三者构建的。“非自然”意味着规范事实、属性、真理等是独立存在的;“非完全”意味着不存在完全基于非规范的规范事实;而“结构”则意味着存在原则,即没有它,非自然主义者就得承认规范事实完全基于其他非规范事实。莫顿认为,非自然主义者关于规范性似乎承诺了两种不一致的主张。他们可以放弃其中一种主张,或者否定这种不一致。因而,非自然主义面临的选择是:(1)诉诸于规范的基础:结构是错误的,但类比原则是真实的;(2)个别主义:个别主义者可以否定结构和“非完全”之间的不一致;(3)无理性的原则:规范原则不需要有基础。

英国利兹大学的薇蕤南(Pekka Vayrynen)对规范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规范性面临的挑战是,一个规范事实的任何解释似乎都依赖一个进一步的规范事实;并且,这种挑战超出规范的解释延伸到了形而上学领域,进而要求作出某种形而上学的假定,并招致规范性解释的负担。另外,规范性的挑战还涉及规范谓词(属性)的不确定性问题,这就要求作出某种语义假定,比如,像“允许的”这样的谓词,其外延的语义事实在总体上就和实际被允许的(错的、好的)东西相关。如果我们必须接受规范事实的存在或者规范要求的结论,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可能导致规范怀疑论的糟糕倒退?

二、规范性与理由

根据理由基础主义者的观点,规范性概念可以根据理由来分析。他们认为规范性谓词都可以化约为理由谓词,或者任何规范性概念中的规范性要素都是理由概念,因而“理由”概念可以充当规范性解释的基础概念。然而,“理由”是否是基本的规范性概念这个论题在规范性研究中依然悬而未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罗德(Errol Lord)和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塞万(Kurt Sylvan)指出了理由基础主义者面临的问题。他们认为,理由基础主义分析面临错误型理由问题。其主要论证是:(1)错

误型理由问题的普遍性揭示了正确型理由的类别比规范理由的类别更宽泛,决定了“适宜性”的理由不是任何强意义上本来规范的;(2)如果(1)是真的,那么理由基础主义就会产生某些严重的问题。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法洛蒂(Federico Faroldi)则对“规范理由的范围”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他认为,有些词,比如“高”和“危险”是分等级的,它们的语义学是标量(scalar)。也就是说,规范理由的范围通常与自然的或者真正的数字不同,范围可能是有界的或无界的、附加的或非附加的、中介的等。法洛蒂认为规范理由毫无疑问是标量:有些是更相关的,有些是更重要的,其他的则带有一个消极的“权重”。他通过语言数据和哲学讨论来研究规范理由这个问题,认为该解决方案具有巨大的实践重要性,因为假如可以获取一个相关理由的完整清单,我们或许能够综合它们来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这也许不太可能,因为理由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也不可能综合考虑单个理由的权重以及混合理由的权重。如此一来,试图建立一个适用于规范理由的分类术语或标量观念的范围就失效了,我们需要转向规范理由的合理范围。不过,是否可以给出这个范围的一个系统解释,则值得怀疑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美国罗格斯大学的李莉(Stephanie Leary)围绕“理由领域探源”这一主题探讨了“规范理由的形而上学解释是否应该统一实践和认知领域”的问题。她的回答是:不完全。她批判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统一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来源”的主张:“实践理由和认知理由都是承担理由关系的”事实使得实践理由和认知理由共同成为规范理由,而它们之所以又是不同类型的理由,是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基础(比如形而上学解释)。李莉指出,“不同来源”的观点既可以解释实践理由和认知理由之间的相似,也可以解释它们之间的不同,它比某些统一性的替代观点更优。当然,由于不能审查所有替代性的方案,所以,也不能保证“不同来源”的观点就是最好的观点。但是,它表明“不同来源”的观点是一个可行的竞争者。元规范(meta-normative)问题是否需要一个跨越实践和认知领域的统一答案还有待细究。

三、规范性与认知

如果规范事实确实是独立存在的,那么这些规范事实是否和其他事实一样具有真值,是否能够独立于我们关于它们的态度而为真,即相关的规范信念的真值条件由什么构成?规范真理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如何保证?这些问题也是规范性研究中十分重要和棘手的问题。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苏克南(Jussi Suikkanen)对帕菲特的非实在主义的认知主义论题提出了质疑。非实在主义的认知主义认为:(1)规范判断是真正的信念;(2)有些规范信念是真的,进而是必然为真的,它们独立于任何人类的态度和判断为真;(3)同时,构成规范命题的部分规范概念是不可还原的、不可分析的和自成一类的规范信念的内容;(4)并且,规范真理没有形而上学或者本体的意思。苏克南认为,非实在主义的认知主义的辩护者没有恰当地回答“相关的规范信念的真理由什么构成”这一问题。首先,符合论真理观明显不可用,因为(4)否定存在与真规范信念相符合的规范实体。其次,冗余论对帕菲特个人也不可用,因为他用规范句子是否打算或者相信为真来区分认知主义和非认知主义。更一般而言,采用冗余论会导致非实在主义的认知主义倒向道德错误理论的保守形式。然而,非实在主义的认知主义者坚持他们的理论不是道德错误理论的一个版本。而如果采用融贯论和实用主义,这些观点又不能协调规范真理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因为非实在主义的认知主义致力于辩护第(2)点。如果采取“真理的认知理论”,这又容易导致恶意的倒退,即为了使某个命题或信念为真,我们需要无限多地进一步地担保信息。对于简约论,它只能规定但不能解释真规范信念的陈腐特征。总之,苏克南认为,非实在主义的认知主义在规范信念的真理问题上存在解释困难。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太珂(Emad Atiq)对元伦理学中“随附的表达主义”论题提出了质疑。表达主义者认为,规范的概念是非表征的;为了展示它们,行动者直接表达他的非认知的态度,比如欲望、偏好或计划。阿太珂则认为,表达主义与“规范的强随附于自然的”这一概念真理不相一致。表

达主义的随附论解释可以避免形而上学的疑难,但存在不融贯的问题:关于规范概念作用方式的语义学应该说明,当某人认识到两种情形在自然的方面是相同的,为什么我们断定他在一种情形而不是另外一种情形中应该去做某事是不融贯的或者无意义的。阿太珂认为,“一个人应该在一种情形中做某事而在另一种情形中不做某事”的判断,以及“这两种情形在自然方面是相同的”是不可理解的。在两种不同的情形中形成不同的信念的可能性并不阻止这两种情形成为不同的。在一事件中,“我”的计划的不同明显是一种非自然的不同。阿太珂指出,非同一的情形和计划视角不是不可区别的。表达主义的困境就在于,对自然的限定不可能包含所有一切,一旦排除所有属性,那么“你”得到的就不是关于随附的计划。阿太珂表示,也许随附的是不正确的;如果正确,它可能不是概念真理;如果它是概念真理,它可能不重要。阿太珂试图表明,如果表达主义是正确的,那它也是不合适的解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亚克斯(Abby Jaques)也对表达主义者的观点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亚克斯认为,表达主义通常有两个目标:一是避免幽灵般的实在论承诺,二是去证明我们的实践。但表达主义者的这些目标是不一致的,他们在作出道德断言的时候作了某些不当的渲染,因而可能面临一些困境:(1)它可以坚持非实在论,然而失去证明我们的实践的能力;(2)它可以证明我们的实践,然而要么屈服于奉行极简主义,要么滑向实在论。当然,亚克斯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表达主义是错误的;它只是表明如果表达主义是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当我们参与道德对话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四、规范性与相对性

规范多样性和规范相对性也是规范性研究中比较热门的主题,有些人坚持认为表面上的规范多样性纯粹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创造某种方式去避免规范的相对主义,并且找到一种方法来调解实践中的不一致。然而也有一些人认为,要解决规范性在事实与效力方面的分歧是不可能的。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奥林德(Ragnar Francen Olinder)就规范分歧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方案。他认为,关于规范分歧的两种标准解释,即信念解释和态度解释存在明显的问题,它们都有相反的承诺。他提出一种新的规范分歧的解释:指向解释(direction account)。在奥林德看来,指向解释能够解释必然的分歧,也不需要依赖于必然的共同内容,不需要依赖于必然的共同存在的欲望。指向解释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感觉道德判断具有实践的指向,因为道德实践的实践功能使我们在道德判断中的兴趣主要是实践的。同时,实践指向在我们的道德判断/归因中被合并为一个必然条件。

土耳其肯特大学的杰克·伍德(Jack Woods)就不同规范要求具有不同约束力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般认为,从直觉上,道德上的“应该”比诸如下棋游戏的“应该”更具权威,道德标准似乎具有实质的或者说具有内在的规范权威。伍德认为,即使我们道德上有义务遵循道德要求,或者有所谓的道德上的“应该”,我们仍然拥有决定性的理由非道德地行事,或者不做应该做的事。在伍德看来,道德上的“应该”并不比其他“应该”更有权威。道德上、礼节上、认知上等,几乎所有领域的规范要求都意味着同样的东西,或者具有同样的特征,因而也应该被一视同仁地看待。对于规范要求的意义,他认为在权威和非权威的“应该”之间没有明显的不同,在指令和非指令式“应该”之间也没有明显的不同,不能生硬地把它们区分为权威的和非权威的。因此,相应地,在实质的义务和纯粹的礼节性义务之间的区分也是误导,并不存在比纯粹的礼仪规范性更高更多的东西。伍德认为,规范的权威来自我们行动的理由,我们(意志上或非意志上)遵守道德、礼仪,但并不存在实践理由的二元论,也不存在关于权威的神秘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 冯瑞梅